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 东鲁王氏农书 译注

[元] 王桢 撰

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Donglu Wangshi Nongshu*  
or Agricultural Treatise of Mr. Wang from Shangdong Province

China'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eries

# 东曹王氏农书

（清）王德信

（清）王德信 著 王德信 校

Downloaded from [www.jku.edu.cn](http://www.jku.edu.cn)

Downloaded from [www.jku.edu.cn](http://www.jku.edu.cn)

Downloaded from [www.jku.edu.cn](http://www.jku.edu.cn)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 东鲁王氏农书<sub>译注</sub>

[元] 王祯 撰

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Donglu Wangshi Nongshu*

or Agricultural Treatise of Mr. Wang from Shangdong Provinc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4833-0

I. 东... II. ①王...②缪...③缪... III. 农学—中国—元代  
IV. S-0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505 号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韩寓群 徐传武 主编**

**东鲁王氏农书译注**

[元]王 祯 撰

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625 插页 5 字数 614,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4833-0

N·3 定价:6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世界科技史后指出，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在秦汉时期编写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五百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南朝的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5926\sim 3.1415927$ 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擅长发现和发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抱着“普及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研究和继承科技方面的民族优秀文化，以鼓舞和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进群众文化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宗旨，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当时，特邀老出版家、科学史学者胡道静先生（1913—2003）为主编。在胡老的指导下，展开了选书和组稿等工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得到许多优秀学者的支持，纷纷担纲撰写。出版后，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套丛书在上个世纪仅出版了五种，就不得不暂停。此后胡老故去，丛书的后继出版工作更是困难重重。为了重新启动这项工程，我社同山东大学合作，并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请韩寓群先生、徐传武先生任主编，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选定书目，重新修订编撰体例，重新约请作者，继续把这项工程尽善尽美地完成。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十余年前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对该丛书体例作了如下修改：

一、继承和保持原体例的特点，重点放在古代科技的专有术语、名词、概念、命题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要求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解释我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尽可能达到反映学术界的现有水平，从而展示出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所存在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个新的要求，对于已出版的五种著作，此次重版也全部修订，改正了有关的注释。希望读者谅解的是，整理古代科技典籍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较年轻、较薄弱的一门学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许多经验性的记载，若要用现代科学原理来彻底解释清楚，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只能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而逐步完成。

二、鉴于今天的读者已不满足于看今译，而要阅读原文，因此新版把译文、注释和原文排列在一起，而不像旧版那样把原文仅作为附录。

三、为了方便外国友人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们将书名全部采用中英文对照。

四、版面重新设计，插图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重新制作，从而以新的面貌，让读者能愉快地阅读。

五、对原来的选目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增加了新的著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重新启动，得到了许多老作者的支持，特别是潘吉星先生，不仅提出修订体例、提供选题、推荐作者等建议，还慨然应允承担此套丛书的英文书名的审核。另外，本书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文化工程的单位和个人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热爱“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老读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期望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 前言

《东鲁王氏农书》，元代王桢撰，也称《王桢农书》。王桢，字伯善，山东东平人，生活于十三、十四世纪之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宣州旌德（今属安徽）县令，大德八年（1304）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令<sup>①</sup>。王氏在两任县令期间，廉政爱民，劝导农业，颇著成效。其《农书》即在任职之时写成。假如以作者写自序之年为成书之年，则其书写成于1313年，但实际可能要早些。

《农书》全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部分的次序，明代嘉靖本等《谷谱》殿后，清代《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等《百谷谱》居中。本译注即依库本次序。三部分自为起讫。自序称：“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但就书中的“目”计算，“二百”实是“三百”之误。今就译注本统计，《农桑通诀》6集26目，《百谷谱》11集83目（11集从王毓瑚校点本），《农器图谱》20集261目，共37集370目。

三部分的写作先后，据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称，王氏调任永丰时送给戴氏的《农书》，只有《农器图谱》和《农桑通诀》两部分，还没有《百谷谱》。据书中《农桑通诀一·蚕事起本》说：

---

<sup>①</sup> 明嘉靖九年（1530）刻行的《王桢农书》移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称“丰城县尹”，误。王桢友人信州教授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称其“来宰永丰”，并称“丰、信近邑”。可丰城在今江西中部，与信州（今江西上饶）和永丰远隔五六百里，不得称“丰、信近邑”。

“尝撰蚕事祭文二篇，以为祈报之礼。其文见《农器谱》。”透露着写《蚕事起本》时，已先有祭文二篇写在《农器图谱十六·蚕神》目中。又《百谷谱十·苧麻》称：“其沤曝之法，刮制之具，亦尝具述。见《农器图谱》。”也透露先写《农器图谱》，而后写《百谷谱》。惟《农器图谱一·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又称：“此图亦见《农书》（按指《农桑通诀》），谓图为农器，故重出于此。”则似乎又是《农桑通诀一·授时篇》的《授时图》先写成，由于图视为农器，所以又把它重列在《农器图谱》中。但无论如何，《图谱》与《通诀》也许先后有交错，而《百谷谱》最后写成，当可肯定。三部分似乎原先并无整体规划，在写作过程中发觉有不足而后补写，也是可能的。《百谷谱》大概在永丰任内最后续成。

《东鲁王氏农书》，全书约计13万余字，插图310幅（一目中有两器或两图以上者，一器一图各以一幅计），从而使此书成为古代农书中，前所未有的、篇幅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农书。

书中《农桑通诀》是农学总论性质，自垦耕、播种、中耕、肥水管理，以至收获贮藏，都有所论述，兼及果木、栽桑，以及家蚕、蜜蜂和牲畜禽鱼的育养，可谓周备，而作全面性的分项论述，尤为独创一格。《百谷谱》是继总论后的栽培各论（库本列此为第二部分是合理的），谷物、蔬菜瓜类、果树、竹木、水生植物等，尤其棉花茶叶，都包括在内，确是兼收并蓄。

《农器图谱》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现存的古代农书中，它是有突出成就的，而晚出的农书，也往往奉其为圭臬。南宋的曾之谨曾经写过一部《农器谱》，书中分列耒耜、耨耩、车戽、蓑笠、铤刈、箠箕、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十项，可惜原书现已失传。王书所列农器门类，与曾书相同而加详，大概是参照曾书而扩充很多。惟曾书只称“谱”，未题“图谱”，似乎是只有叙说而无图样，果真如此，则王书的绘“图”写“谱”，在我国传统农具的发展史上，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特别值得珍视。尤其是有些农器为王氏所创制，更见其富有兴农热忱。今举数例，以表彰其苦心经营，如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皆出新制”；水轮三事，“今创

此制，幸识者述焉”；连磨，“世罕有传者，今乃寻绎搜索，……既图于前，复叙于后，庶来者效之，以广食利”；水排，“去古已远，失其制度，今特多方搜访，列为图谱，庶冶炼者得之，不惟国用充足，又使民铸多便”；水转连磨，因见到江西的茶磨茶碓，而创此连磨连碓农器，“诚济世之奇术”，等等。王祯还进一步实践制造新器，并作试验，例如水碓，“水利中未有此制，今特造立，庶临流之家以凭仿用，可为永利”；高转筒车，“此近创捷法，已经较试，庶用者述之”。如此制造新器示范，并临流装置试验，不是徒然纸上谈兵，其为民造福的热情，使人感佩。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南北“比较农业”的反映。农业因地区、土壤、气候、水利条件等的不同，有其地区性，所谓因时因地制宜，历来重视。但不能囿于陈规，拘泥自茧，在照顾一定差别的条件下，更应南北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以取得互利而提高农业生产。在这方面王祯是特别强调的，在所著的三部分中都有所述及，尤其在农器方面，反映得更多。这些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仅谈一件，如《农器图谱十六·蚕簇》比较南北簇蚕的方法，南方的屋里簇和北方的屋外露簇，各有利弊，而北方的露簇为害更大，王氏指出：“蒿薪积叠，不无覆压之害；风雨浸浥，亦有翻倒之〔烦〕；复内外寒燠之不匀，或高下稀密之易所：以致簇内病生、茧少，皆由此故。习俗既久，未能遽革！”最后援引北宋梅尧臣《蚕簇》诗作结论：“竞畏风雨寒，露簇未如屋。”所论极为中肯合理。

基于全国通盘考虑的思想，王祯不同意“风土不宜”之说，他对甜瓜、苧麻、棉花的固守风土不宜提出批评，认为作物引种问题，关键在于栽培管理技术的是否合理。这种思想是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的作者之一孟祺首创，王祯赞同而继述之。此说深得明代徐光启的赞许。不过，风土所宜还是有的，岭南很多植物在今天也不能贸然移植于北地，孟、王所批评的，该是那些“唯风土论”的人吧。

## 二

王桢的生平事迹，今天留下的文献很少，但有两件比较重要，兹摘引以供探讨。其一是“元帝刻行《王桢农书》诏书抄白”<sup>①</sup>，诏书是应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司副提举祝将仕<sup>②</sup>的牒请刻印王书而下。祝将仕说：

切见承事郎信州路永丰县尹王桢，东鲁名儒，年高学博，南北游宦，涉历有年。

其二是王桢儒友信州教授戴表元写的《王伯善农书序》：

丙申岁（1296），客宣城县（今属安徽），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蒔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镛、耒、耜、耨、耰、耨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他县为宰者群擲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赖而诵歌之。盖伯善不独教之以为农之方与器，又能不扰而安全之，使民心驯而日化之也。后六年（1304），余以荐得官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伯善再调来宰永丰（今江西广丰）。丰、信近邑（广丰与上饶近在咫尺）。……伯善之政孚于永丰又加速，大抵不异居旌德时，山斋修然，终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动一檄，而民趋功听令惟谨。

---

① 此“诏书抄白”不见于国内任何《王氏农书》刻本和各家书目，仅见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的一部嘉靖刻本中。诏书时间为“大德八年”（1304），提到《农桑通诀》、《农器图谱》、《谷谱》三部分俱全，但这一年是王桢调任永丰之年，还没有《百谷谱》，是为可疑。但这不影响祝将仕对王桢学问行迹的记述。

② 将仕：官阶名，即将仕郎。

祝氏称王祜“年高学博，南北游宦”。的确，王祜学问广博，其所涉览，经史、农书不必说，兼及诸子、医学本草、重要类书、笔记杂录，尤其熟识名人诗赋之类，信手拈来，运用贴切，从所著书中可以反映出来，所称“东鲁名儒，年高学博”，并非虚语。

至于说“南北游宦”，一般只知道他在江南做官，但从全书中搜索，宦游南北也确实颇有眉目。先说北方，例如铲，说：“今营州之东，燕蓟以北，农家种沟田者皆用之。”《铲诗》云：“尝见燕赵北，亦传辽池东。”《油榨》说：“今燕赵间创法……”《麦绰》说：“尝见北地……”《耕索》说：“今秦晋之地，亦用长辕犁（按指二牛抬杠）……如山东及淮汉等处用三牛四牛（按谓数牛合为一轭）。”这些地区，除山东是王祜原籍外，其余燕、赵、秦、晋、营州等地，均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及辽宁等地，而蓟在今北京，淮河、汉水也在长江以北。至于江淮之间，更是“愚尝客居江淮，目击其事”（《沙田》），书中“江淮”、“淮上”、“淮人”、“淮民”等提到很多，又说“今海陵人泥行……用之”（《橇》），海陵为今江苏泰州。可见王氏对江淮之间的农业情况尤为熟识。

再说江南，他足迹所及，非仅限于皖东南的旌德和赣东隅的永丰二县，江、浙、湘、赣等地区他都到过，诸如“余尝盛夏过吴中”（《薅马》），“今平江虎丘寺剑池……”（《高转筒车》）“尝见江东农家用之”（《镢锄》），“尝见浙间一种，谓之阴瓜”（《甜瓜》），“尝见于江浙农家”（《筛谷筛》），“尝到江西等处”（《水转连磨》），“今湖湘间收禾，并用笊架悬之”（《笊架》），等等，不一而足。

或者说，有的北方地区，也许只是听人传言，未必亲临其地。但无论如何，他“尝见”的地方不少，特别是“蓟城”，即元代的都城（今北京），他可能淹留得比较久，因为那是他游宦“候差”的地区。而他在调任永丰县令时，已是“年高”（祝将仕语）。在首都长期候差的岁月中，他可能去过邻近的山西、燕北、冀东等地。

《栗》目说到“愚尝见燕山栗”，是佐证之一。

下面再就戴《序》来考察。据《元史卷一九〇·儒学·戴表元传》，戴氏于大德八年（1304），年已六十余，始得荐举任信州教授。这年就是《序》中说的“后六年”，也就是王祜调任永丰县令之年。上溯“六年”前的三年是1295年到1298年，这三年就是《序》中称赞王氏因政绩好而百姓歌颂之的“如是三年”。而戴氏客居宣城在“丙申岁”，即1296年，则下距1298年只有两年，不足“三年”之数，以此可证，王祜始任旌德县令应从1296年上推一年为1295年，始合“如是三年”之数。事实上，这也符合实情，因为王氏不可能一到任便有善政传播到客居邻县的戴氏耳中，必须经过一年半载的时间。因此，我推定王祜始任旌德之年为1295年，到1304年调任离职，在旌德共连任九年。假如县令以三年为一任，则王祜在旌德连满三秩，足见其治绩深得民心，司部考核“优异”，故而秩满一再连任，这在元代的地方守令中是不多见的。

无独有偶，《王氏农书》自序写于1313年，上溯到1304年调任永丰也刚刚是九年。这是巧合，还是在永丰又连任九年，就不得而知了。但《百谷谱》似乎不应写了九年之久。因为王氏自称在旌德时“方撰《农书》”，调任永丰时，“《农书》方成”（《杂录·造活字印书法》）。此所谓《农书》，据戴《序》实为《农器图谱》和《农桑通诀》两部分，不包括《百谷谱》，《百谷谱》是在永丰续写的。但到永丰后写《百谷谱》迁延九年之久，比前二部分要慢得多。王祜到永丰时已是“年高”，是否因此而迁延，还是写成《百谷谱》后隔一段时间再写自序，如果是后者，那末全书的写成，实际比1313年要早些。

### 三

王祜的为人和治民政绩，戴《序》中已有具体记述。这里需要考查的是所记是真实的呢，还是作序人的褒美之词？

先谈教民种艺和图画农器。《农书》中虽然没有将耕作栽培技术直接对农民“授之以方”，但书中所记实际都是这些内容，自然是间接在教导农民以种艺之法。农器指导操作技术，操作技术依赖农器，二者本为一体。王氏绘图写谱，本身就是为了教民种艺。

关于图画农器，只要寻绎原书，则为时代远隔，古器失传；为地区不同，他处未见；为同工而异器，取长补短；为减轻劳动强度和农民的辛劳；为工作效率和普及农家利益，王氏特为多方搜索而图画农器者，不一而足；其余常器，更无论矣。其中并有直接命工制造者，例如《锋诗》：“兼材宜不废，图象付良工”；《耘盪诗》：“愿将制度付国工，遍使吾农资稼穡”；比较复杂的机械装置，如翻车，特别指出：“此车关键颇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如水碓，“今特造立”；如高转筒车，“已经较试”，等等。则明显指出曾制造实器或作示范试验，以教民广用。戴《序》还记载：

（王禎）岁时属耆者、强壮，问能从吾言试其具；幸而能，则大喜，出卮酒相劝奖；即不能，或怠惰不帅教，辄顰蹙，展转引愧，如不自容。

王禎进行年终考核，老农或青壮年能使用某些农具时，则大喜而奖励之；如或不能，或者根本不听命时，则忧愧自责未能化民，但“不施一鞭”，不加威逼。假如没有戴《序》的提示，所谓“付国工”，所谓“造立”或“较试”，也只是一看滑过，或认为是文人的意兴所及而增饰，今读戴《序》，乃可推知确有图样、模型或新农具颁发下去，若复杂机械则加以示范试验，使民仿效。

王禎为人澹泊，为政清廉，戴《序》言之凿凿。试就《农器图谱》中考察，有些简直像新石器时代的老古董，如老瓦盆、匏樽、瓢杯之类，殊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可他却称赞说“今瓦盆盛酒，有复古淳俭之风”，“今举匏樽，倾瓢杯，何田家之有真趣也”。如

缶，其诗曰：“眷然还忆古遗风……好共农家老瓦盆，侑我田歌成一醉。”初疑其冬烘倒退，思想陈腐，联系他的一系列表现，却反映他淳真反朴，澹泊为怀的心情，戴氏所谓“山斋修然，终日清坐”的情态，跃然纸上。

正因为有这样淳朴寡欲的心情，所以他非常羡慕归隐江南鱼米之乡。如《长镰诗》：“我亦从今事兹器，东皋甘作力田人。”《陂塘诗》：“便当卜此成归计，鱼稻乡中好度年。”《农舟赋》：“吾将挈家于此而就食，听其所止于鱼稻之乡。”

书中多处反映其恤民之心，如描述梯田耕作的劳累，手耘、足耘的艰辛，“守舍”蹉伏草窝的凄楚，《禾檐诗》：“才使颊肩到场圃，主家仓廩又催收。”《牛转翻车诗》：“日日车头踏万回，重劳人力亦堪哀。”等等。又往往以富贵与贫民对比，刺富而悯贫。例如刺富，《蚕室火仓诗》：“谁识贵家欢饮处，红炉画阁簇婵媛。”《缫丝冷盆诗》：“不似贵家华屋底，空教纤手弄清泉。”《蟠车诗》：“岂知罗绮辈，惟务拨琵琶。”等等。其悯农，例如《簦诗》：“今岁租粮毕，空虚奈尔何！”《阴沟（暗渠）诗》：“却嗟疏凿劳民力，安得鞭驱万鬼工？”三国吴时鲁肃慷慨资助周瑜军粮三千斛，《困诗》讥刺之：“只知不负英雄谒，遇歉能倾一济贫？”等等。

对胥吏的箕敛无厌，尤表现为痛心。如《宴诗》：“一朝催租急，肯许防饥凶？”《芟麦歌》：“自余宿负如取寄，指此有秋争蚁萃。一得岂能偿百费，终岁勤劳一歔歔！”《缫车诗》：“岂知县吏已催科，不时揭去无余绌。迫索仍忧宿负多，车乎车乎将奈何！”等等。王氏目睹农民的力瘁赋重，常自愧廩食公帑，未能给农民多做有益之事，如《耘耔诗》：“至若执笔公署间，但仰廩支供口费。”《区田诗》：“揭来学制古侯邦，承恩例署兼农事（按，指县令兼署“劝农”职衔）；带山田少（按，旌德、永丰均在山陵地区）缺食多，教不及民深可愧！”

自己清廉自守、自愧素餐者，必然对居官而不问民间疾苦者，予以讥刺抨击，如《守舍诗》：“世族多少居华堂，安然熟寝无更

长，便腹何尝乏稻粱！”《芟麦歌》：“昨日公堂宴宾贵，尊俎横陈混肴馐，檀板珠绳按歌吹，万钱不直供一醉。庖人搓揉出精粹，尚喜食新夸饼饵。物不天来皆力致，饱食何人知所自？”尤其对那些浑浑噩噩而为民上者，给予强烈抨击，《农桑通诀四·劝助篇》揭露：他们不知衣食之所从来，惟以骄奢为乐，甚至苛敛无度，刮民脂膏以肥己。他们都兼署“劝农”职衔，自己不懂农事，怎能劝农？却假借“劝农”名义，没有下乡，先发公文告知各乡各社，一到乡间，便集合乡民，头会箕敛，满载而归！对这种欺上贼下的勾当，希望上面制订法规制裁，以杜绝流弊，则百姓幸甚！这些人正包括戴《序》指出的“他县为宰者群擲揄之”的那些人，自己尸位蝗食，反而讥笑他人为民尽职，难怪王氏看不顺眼，而描绘此辈的憎贪嘴脸，也可谓淋漓尽致。而王氏的长鞭所挥，还触及封建最高统治者，讥讽“时君世主”，虽然也有注意农桑的，然而田野没有完全垦辟，仓廩并未完全充实，游惰之民未见完全归农，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看来只是发了一纸“劝农”空文，而没有施行实际有效的措施吧！正因如此，他重在实践教民种艺之法，颁发农器图样使民仿造，所以他不发公文下乡扰民，戴氏所谓“不施一鞭，不动一檄，而民趋功听令惟谨”，似亦属实。不过，在元代蒙古贵族的高压统治下，汉人王祜竟敢影射蒙古“皇上”，可谓“胆大包天”，难能可贵。

王祜擅长写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铭、赞、诗、赋，亦风雅可诵”，清人顾嗣立选编的《元诗选》中选录他的农器诗不少。的确，他的诗赋等都写得好。一般说来，善诗者未必善农，善农者未必善诗，而王氏诗、农兼备，可谓多才多艺，非同一般。我们在农学上重实不重虚，对王书中附在每件农器后面的诗歌等，往往一溜过去，不值一顾，然而，仅就上面所举的少数诗例中，已足反映王氏的为人处世，道德涵养，喜、怒、哀、乐，好恶分明，而这些在他的记实文章中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熟识王祜，研究王祜，在文献贫乏的情况下，对他的诗歌，尤其不能轻易放过，因为诗言志，诗为心声嘛。

王祯目芥菜为“蔬茹中之介然者”，生姜祛邪辟恶，“蔬茹中之拂士也”，其人澹泊清廉，耿介疾恶，或亦以自况欤？

## 四

金无足赤，书无完书。在肯定王祯著作的优点和成就之外，也应指出其中不足的一面。本书的优缺点，或许是二八开吧。具体缺点都已在校记、注释中指出，概括起来，可分作十二项说明如下。

### 一、引书张冠李戴

此类很多，又可分为：（1）书名，如《广志》误为《广雅》（《梁秫》），《韩非子》误为《淮南子》（《檀子》），《本草衍义》误为《本草图经》而又轻率截割去沙藏保鲜法（《栗》），等等。

（2）篇名，如《周礼·乡大夫》误作《周礼·大司徒》（《孝弟力田篇》），《货殖传》误作《食货志》（《橘》）等。（3）作者，如王安石误作梅尧臣（《田漏》）；陆元恪误作陆士衡（《芹蓼》），因为二人同名“陆机”而致误等。（4）内容，如以《风土记》的“博士芋”误作《广志》（《芋》），以《本草图经》的内容当作《尔雅》郭璞注（《李》），等等。

### 二、引文割裂破碎，又揉合搀杂

如上举栗例就被阉割去精髓，而割裂又往往连带揉杂。如《铤》目引《释名》，中腰截断，而中间又夹杂着《集韵》。夹杂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一书而插入他书者，有远隔他书而绞乱前书者，有突然“夹带”己文者，又有以己意塞进注解者。只举两例，以示其失。如《柿》目引《齐民要术》（简称《要术》）

“梗枣”，塞进注解：“红蓝枣，似柿。”按：梗枣即软枣，即柿树科的君迁子（*Diospyros lotus*），以其浆果熟时由黄色变为蓝黑色，故又名“红蓝枣”（虽有枣名，实非枣类）。但由于王祯的插注，致使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误认为“红蓝枣”出自《要术》。

《萆》目先引《淮南子》，继引孔融《同岁论》，而《同岁论》下接称“又曰”，却并非《同岁论》，而实为《淮南子》。其误为抄

引《太平御览》（简称《御览》）的失察。此种混乱现象，在王书实非少数。

### 三、依样葫芦，蹈袭前误

（1）地名，如《砺》目引《尚书·禹贡》，荆州误为扬州，错误根源是蹈袭《御览》卷767“砺”目引《禹贡》的错成“扬州”。《浚渠》目的“广戾渠”是戾陵渠之误，也是蹈袭《御览》卷821“田”目引《魏志》的误文而来。（2）时令，如《锄治篇》的“仲夏之月”是“季夏之月”之误，是承袭曾氏《农书》引《礼记·月令》之误而来。奇怪的是曾氏之误与陈旉《农书》之误雷同。（3）名物，如《蓑》目的莎草“又名薛”，“薛”是“薛”字之误，是承袭《六韬·龙韬·农器》的误字而来。按：薛是薮蒿，是蒿类，不能作蓑衣；薛是莎草科的莎（suō）草（*Cyperus rotundus*），多年生草本，叶片线形，古时用作蓑衣材料。二字相差甚微，承误已久，《四部丛刊》本《六韬》亦误作“薛”。王氏袭而不察，只是照葫芦画瓢。

### 四、掇抄前人不标明出处

此类极多，仅举两例，却使人很惊异：《牛》目抄录了南宋周必大为曾之谨《农器谱》所作的序文一大段，周必大不同意牛耕始于三代之说，以“愚谓不然”发挥己见，“愚”当然是周必大自称，可王氏也照抄“愚谓不然”，变成自己的话，实感意外失常，因为王氏没有标明出处，而是以自己叙述的方式出现的。如不查明根源，势必没周而自炫。

也有不标明出处而误书者，如《大豆》目说：“获豆之法贵晚，盖早则零落而损实也。”此条实出《要术·大豆》篇，它记载：“收刈欲晚。（自注：此不零落，刈早损实。）”按：大豆品种有容易裂荚与否的不同，裂荚在成熟之后，青豆是不会裂荚的。容易裂荚的自然应该早些收获，以免晚了“零落”地下。《要术》所述的品种是不易裂荚的，所以不妨晚收，早收了反而子粒没有充实饱满受损失。但王氏改为“早则零落”，却违背了植物生理规律，既是“贵晚”不裂荚的品种，早也不会零落。如不查根源，将